

#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现代性变革探析<sup>\*</sup>

田慧芳

**摘要**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在具有留学背景的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人的合力推动下,北京大学图书馆积极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基于现代大学图书馆必须具备教育功能、学术研究功能和开放性的先进理念,在专业馆舍建设、多渠道馆藏、专业化管理、馆际交流及国际化等方面进行现代性变革的探索,实现了从封建藏书楼向现代大学图书馆的转变。参考文献 18。

**关键词** 五四运动 北京大学图书馆 变革

## Analysis on the Modernity Reform of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

Tian Huifang

**Abstract:**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1919,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actively implemented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freedom of thought, all-inclusiveness”. With the combined efforts of Cai Yuanpei, Jiang Menglin, Li Dazhao and others with overseas study backgrounds, and based on the advanced concept that modern university libraries must have educational function, academic research function and openness,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explored modern cha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libraries, multi-channel collection,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interlibrary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finally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feudal library to modern university library. 18 refs.

**Keywords:** May 4th Movement;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Change

辛亥革命之后,封建专制政权倒台,民国共和政体建立,京师大学堂也于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下文简称“北大”)。然而,北大图书馆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惯性使其仍然保留了很多封建藏书楼的痕迹。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也是北大图书馆发展历程中的转折点。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具有留学背景的学者先后入职北大,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借鉴欧美先进经验,基于现代大学图书馆除文献收藏外还必须具备教育、学术研究等功能和开放性的先进理念,积极推动北

大图书馆的现代性变革。以时任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更是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将北大图书馆作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百年后的今天,回眸北大图书馆的这场变革,其影响之深远,值得深思。

### 1 关于大学图书馆功能的现代意识

我国图书馆的前身称为藏书楼,其功能以收藏为主,利用为辅,且利用者局限于少数人。现代大学图书馆在我国最早出现于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1879年创办,当时叫圣约翰学院)。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我国第一所国立大

<sup>\*</sup> 本文系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師科研基礎能力提升項目“李大釗北大圖書館改革與北大精神塑造研究”(項目編號:2019KY0604)和玉林師範學院校級科研項目(項目編號:2018YJKY26)研究成果之一。

学,其图书馆最初称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1904年改名为京师大学堂图书馆,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但是其功能仍以传统的文献收藏和校内教学参考为主。直至1917年底李大钊出任图书馆主任,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具有东西洋留学经历的学者们开启了北大图书馆具有现代功能意识的改革。

### 1.1 现代大学图书馆的教育功能

蔡元培是我国最早从事新式教育的代表之一,对现代图书馆的教育功能认识十分深刻。1907年至1911年11月,不惑之年的蔡元培赴德国留学四年,主要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留学经历使他对方现代大学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及其重要性认识深刻。1912年5月13日,蔡元培作为教育总长在向参议院宣布政见的演说中提出:“对于大学校图书馆等未完成者,皆渐图结束前局,而于一定期间内,为革新之起点”<sup>[1](165)</sup>。1913年9月至1916年11月,他又留欧三年,主要在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和法华教育工作。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大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出了两大办学要事,其一就是要为北大图书馆多购新书。1917年底,他聘请李大钊出任专职图书馆主任,并鼎力支持其改革。据章士钊回忆:“吾入北京大学讲逻辑,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其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而以吾素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子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sup>[2](145)</sup>1920年秋,蔡元培和罗素、杜威等在湖南长沙应邀举行学术演讲会,在《何谓文化》的演讲中阐述了他对图书馆与教育关系的认识:“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以外,还有许多的机关,第一是图书馆。凡是有志读书而无力买书的人,或是孤本抄本,极难得的书,都可以到图书馆研究”<sup>[3](13)</sup>。

蒋梦麟为蔡元培任职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时的学生,1904至1908年在南洋公学读书,1908年

8月至1917年3月赴美留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留美近十年,蒋梦麟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发达的高校图书馆事业进行了深入观察:“学院馆渐渐成为教学计划中的活跃部门,新的教学法要求学生多应用图书馆藏书。教师们对图书馆藏书的选购亦渐多关注,图书馆的经费亦有增加。讨论式教学法尤其强调对书籍的参考应用”<sup>[4](240)</sup>。蒋梦麟于1919年初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后任职总务长(当时北大图书馆隶属总务处),并多次代理校长,以这种先进思想来指导北大图书馆的建设。

李大钊于1907年至1913年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是该校首批毕业生;1913年至1916年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就读,对日本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功能也有较明确的体认。1917年底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的工作实践,使他对图书馆的教育功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20年,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下文简称“北高师”)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上提出了自己关于图书馆以及图书馆与教育的看法:“图书馆有两种:一是社会的,一是学校的。社会图书馆的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学校图书馆的对象是学生。这两种的性质不同,所以形式也不一样”<sup>[5](132)</sup>,”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和社会教育更有关系”<sup>[5](134)</sup>。

基于对现代大学图书馆教育功能的深刻认识,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在沙滩红楼图书馆建立不久,就一起推动理想中的北大新图书馆建设。1935年,功能完善的北大新图书馆在蒋梦麟任校长期间建成,圆了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北大入多年的梦想。

### 1.2 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开放性与学术研究功能

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功能特征,不仅仅是教育,更重要的是其开放性,是新文化、新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基地。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1921年,他为新图书馆建设到美国筹资,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上

承诺:“况图书馆之用,不仅限于一隅。譬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不惟北大生可用,北京人及各省人亦可用,即诸位回国时或外国人欲研究任何问题,亦可径往参考”<sup>[3](59)]</sup>。留学美国的蒋梦麟则特别重视大学图书馆的学术研究功能,“提高学术,第一要工具,第二要人才。人材就是专门学术之导师,工具就是学校的设备——如图书、仪器等……”,<sup>[6](224)]</sup>“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sup>[6](225)]</sup>。这与李大钊在北大成立第二十五周年纪念感言中提出的“……从学术的发明上预备将来伟大的纪念品……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为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sup>[7](109)]</sup>遥相呼应。李大钊认为现代大学图书馆就是研究室。他在1919年北高师图书馆两周年纪念会上提出:“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一句话说,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但是想达到这种完美教育的方针,不是依赖图书馆不可”<sup>[5](132)]</sup>，“……古代的图书馆和现在的性质完全不同,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sup>[5](132)]</sup>。

根据图书馆的学术研究功能和开放性,沙滩红楼图书馆更加注重阅览室的建设和利用。李大钊于1920年初发布《图书馆主任告白》:“本馆设有五阅览室,颇足使用,开馆时间又长,阅者诸君幸常来馆阅览,当无不便之处,且可藉此以养成利用图书馆之习惯。”<sup>[5](169)]</sup>在这种认识的积极引导下,加之丰富的馆藏、开放的氛围和良好的研讨环境,北大图书馆逐渐成为研究和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李大钊更是将北大图书馆建成了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地。1920年3月31日,北大学生读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的支持下相继成立,活动地点主要设在图书馆。曾任北大图书馆书记员的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

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sup>[8](40-41)]</sup>。

## 2 馆舍建设的现代化探索

京师大学堂时期(1898—1912),藏书楼(1904年改名图书馆)在景山东街的马神庙和嘉公主府大殿之后的公主闺阁,至今已无法窥得该藏书楼的规模和真实面目。按照中国传统的建筑格局,公主闺阁的布局一般是格局不大、温馨家居的布置,这种住宅性用房并不符合现代大学图书馆所需,其首批藏书也于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毁于战火。1902年2月,随着京师大学堂的续办,藏书得以重新购置。北大图书馆以公主闺阁作为馆舍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18年沙滩红楼图书馆的启用。

### 2.1 初具现代性的北大沙滩红楼图书馆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图书馆随本部搬迁至沙滩红楼,占据红楼的一层。李大钊对其功能布局颇为用心,上任仅两个月,他就带队去了“新图书馆运动”干将戴志骞、袁同礼主持的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观学习,为图书馆搬迁做准备。“吾辈此次参观第一目的即在图书馆,故是日在图书馆中所耗之时间为最多。”<sup>[9](185)]</sup>李大钊向袁同礼等清华学校图书馆同仁虚心学习了先进的建馆理念,比如:书库与阅览室分设而相毗邻;图书馆的防火问题;通风与采光问题;尽量多设置阅览室;图书馆书库设置要适应开架式借阅的需要;目录全用卡片式;教员及普通人员的申请购书程序;等等。特别是清华学校图书馆的表格式杂志推荐阅读方式,李大钊认为“此法甚善,并可推广其意,分门别类,将各杂志中之重要论文编成Card式之目录,以供研究某种问题时依类检集材料之用”<sup>[5](186)]</sup>。这些经验被用在红楼图书馆的布置上,使得其布局和功能设置初步具备了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基本特征。

### 2.2 符合现代大学要求的北大新图书馆馆舍

随着现代大学职能的扩充,大学对图书馆建

筑的专门性和管理的专业化要求日益提高。北大最早的图书馆是由公主府的闺阁和马神庙改造而成,沙滩红楼图书馆也只是占据了红楼的一层,和校部、文科教室共用该建筑,这些都不能满足现代大学对专门性图书馆的需求。北大关于建设专门性新图书馆的构想始于1920年,蒋梦麟在入职北大的第二个年头,就与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慨然有筹备大图书馆之计画”<sup>[10](1970)</sup>,“室内陈列,依美国最新办法办理”<sup>[10](1970)</sup>,他们一起制定了“建筑馆舍”“购置书籍”“养成专才”的新北大图书馆建设规划<sup>[10](1972)</sup>。1922年,在北大25周年紀念日上,蒋梦麟提出:“希望要有好的‘工具’”,“还要造一个图书馆,我们方有研究和创造学术的地方”<sup>[6](221)</sup>。为此,蒋梦麟和蔡元培还亲自到国外为新图书馆的建设筹款。据石烈娟考证:“除1920年底蔡元培先生赴欧美筹款外,蒋梦麟也在美国募捐扩充图书馆。在1922年2月25日召开的北大评议会第六次会议上,主席报告并通过了因蒋梦麟在美为北大图书馆募捐延续假期及现请谭仲逵代理总长案。”<sup>[11]</sup>由于经费问题,新图书馆在1935年蒋梦麟任校长时才得以建成,蒋梦麟自兼馆长。

### 3 馆藏建设的现代性思维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首批馆藏来自强学会藏书和官书局藏书院的藏书,八国联军侵华时被毁。1902年馆藏重置,新的馆藏包括并入的同文馆馆藏、由清政府向各地官书局征调的图书和巴陵方氏碧琳琅馆藏书等个人捐赠。此后,常年馆藏的增置则以各地官书局征调为主。1909年后,改征调为有偿购买。由于学校国立官办的性质,北大图书馆馆藏建设内容受封建官僚思想之局限,经费也因政府财政拮据而无保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李大钊出任图书馆主任,才有了很大改变。

#### 3.1 设立图书购置年度经费,保证馆藏不断更新

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人十分注重图书

馆藏建设。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中谈到:“余到校视事仅数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奔二事:一改良讲义。……二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买,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sup>[12](7)</sup>。1919年入职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对西文藏书更为关注,在1920年北大成立23周年纪念会上,为便利师生学术研究,蒋梦麟倡议“先要改良图书馆,多买西籍”<sup>[6](213)</sup>,“近来购置西文书籍之方针,决以多购整套杂志为原则,以便供研究某种专门问题者汇集之系统之材料”<sup>[10](1966)</sup>。随后,他提出了北大筹备新图书馆的计划,希望建设新馆,多渠道增加馆藏。

1920年5月,在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北大图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北大校行政会议通过了“预算案内之添购图书费应定为每年六万元”<sup>[13](318)</sup>的决议,北大图书馆第一次有了常年购书经费的保障。“此后七年中,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sup>[14](132)</sup>例如,北大图书馆本来藏有一批词曲书,但1910年刘廷琛任学校总监督时,把词曲书看作是淫词艳曲有伤风化,一把火烧掉。1918年北大成立了国文研究所,深感文献资料缺乏,图书馆为满足他们的研究需要,便又“大买起词曲书来”,此举在当时颇为全校师生所瞩目,他们赞许这是校长蔡元培和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对北大的“又一贡献”<sup>[15]</sup>。

#### 3.2 积极发动寄存和捐赠,多渠道充实馆藏

除了常规的采购渠道外,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图书馆还通过捐赠、寄存等渠道不断扩充馆藏,图书馆专门出台了《图书馆寄存图书简章》。在许德珩和李大钊的运作下,著名藏书家江西九江李盛铎(木斋)将自己的部分藏书捐赠给了北大图书馆<sup>[16]</sup>。作为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于1918年4月向北大图书馆捐赠了1912—1913年自己和章士钊共同主编的《独立周报》全套,1922年4

月捐赠了自己精心收藏保存了十多年的五十二期《国风报》(共出版五十三期)<sup>[18]</sup>。

### 3.3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丰富西文馆藏

五四运动后,北大图书馆还通过国际出版物互换、国际捐赠等方式不断丰富西文馆藏。据吴祿年考证<sup>[18]</sup>:北大资助校友袁同礼留学欧美期间(1920—1924),通过袁同礼“抓住一切机会,拓展北大与美国学界的文献交流渠道”,先后促成了北大图书馆和夏威夷大学图书馆出版物的互换、和纽约植物院的印刷品互换,为北大图书馆收集了美国图书出版目录,联络美国国会图书馆向北大图书馆赠送图书馆全套目录,联络加尼奇万国和平会向北大图书馆捐赠该会书籍,并积极参与了北大新图书馆建设经费的美国募捐活动。这些活动有效地推进了北大图书馆西文馆藏建设和国际交流业务。

## 4 图书馆管理的现代性变革

民国肇始,1912年至1914年1月期间,北大图书馆主任一职长时间缺位,之后的主管者又多是兼职,图书馆地位不高,管理队伍专业性不强,图书编目方法落后,管理制度日渐废弛,师生借书逾期不还者众多。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在这些方面积极推动了现代性变革。

### 4.1 加强服务管理,完善治理模式

李大钊上任后,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针对大量师生借书逾期不还导致流通不畅的顽疾,积极整顿。1918年、1920年两次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发布图书馆主任通告,催还逾期图书。李大钊还十分注重服务师生,上任后所发布的《图书馆主任告白》就是向本校读者推介天津博物院陈列品,认为“颇足供学术上之参考。吾校同人研考博物者,盍一往观”<sup>[5](182)]</sup>;同时,重视读者意见,提高服务意识,延长开馆时间,并以身作则,多次通过图书馆主任告白的形式回复读者函询。在管理模式逐渐规范化的基础上,李大钊推出了《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使北大图书馆的业务工作走向了正轨化。

1920年,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借鉴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治理模式,不断提高图书馆在学校行政中的地位。蒋梦麟与蔡元培等人一起努力促使李大钊被聘为教授,并进一步成为北大评议会委员,其关于图书馆改革的思想得以在更高的平台上宣传推广。他们还推动成立了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根据1920年5月北大图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形成的《图书委员会致校长之报告书(一)》,北大图书委员会由七人组成,设委员长一名,委员六人,议决有关图书部应兴应革事务及经费安排、图书设备采购、管理规章制定修订等事项;书刊订购要先提交给图书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才能购买<sup>[13](348)]</sup>。图书委员会的设置既提高了书刊订购的科学性,又使北大图书馆的发展有了制度保障。

### 4.2 科学分类编目,推行开架借阅

五四运动前后,北大图书馆不断完善图书的科学分类和管理。西文图书以“杜威十进法”为基础,建立了新式卡片目录。中文图书则在传统经史子集分类的基础上,增设了地理、丛书、类书、科学等类;编制了书名、著者、类别三种卡片目录,提供多种检索途径。同时,蔡元培、李大钊等还通过袁同礼向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订购了目录卡片,并仿清华学校图书馆样式订制了专门的卡片目录柜。另外,在图书流通管理上,推行开架式管理,方便读者借阅。

### 4.3 重视馆员队伍建设,关心员工专业发展

李大钊十分注重图书馆员工队伍的建设。在1919年12月的“北高师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他提出:“他(作者注:清华学校)想明年暑假办一个图书馆教育传习所,但是他在城外,也有许多的不便利,所以我仍是希望贵校举行。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请诸位注意”<sup>[5](134)]</sup>。1920年8月,“北高师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顺利举办,李大钊亲自主讲了图书馆教育的内容,并组织北大图书馆馆员参加了这次培训。

对于图书馆员工,无论何种身份,李大钊都对

其发展关怀备至。1921年10月,李大钊在致蒋梦麟的信中提到:“腾君统音在图书部专司各系参考室事,昨接星枢先生信称已由聘任委员会存记为助教,此事前曾在总务会议提出两次,均决议以须查明聘任委员会是否通过再下聘书,今既查明已经通过,请即致送聘书为祷!又,装订室校役王君建中(曾在高小卒业)已拨在第二院典书课充试用书记,请通知杂务课及文牍处从停止校役工给之日起,按初级试用书记发薪。又,新聘本校德文系学生向景君为编目课临时书记,专理德文书籍,月薪十五元,自十月六日起来馆办事。兹将启书呈上,乞查收。但敝处尚有事务员高君仁山及书记刘君瑞昌、赵君增选,并未接到此项函件,即希补发至祷”<sup>[13](305)</sup>。北大图书馆还聘用了能力水平较高的本科生作为“助教式”工作人员,既为一些生活困难学生提供了勤工俭学的岗位,也提升了当时北大图书馆的学科服务能力,更培养了一支将来可能从事图书馆管理工作的高素质队伍。

#### 4.4 倡导馆际合作,重视国际交流

由于清华与北大同处一城,时任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的袁同礼又是北大校友,因此两校图书馆之间来往十分频繁。李大钊上任不到三个月,就带队赴清华学校图书馆学习,双方进一步确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此种关系从李大钊致袁同礼的信函中可见一斑:

守和先生:

乘赐各件及手示均悉。拙译《国际法论》呈上一册,捐赠贵馆,并乞指正。交换书籍已按单检齐,俟法科将书送到,即汇呈尊处。敝馆所欲借阅之书,容后函告。诸蒙垂爱,感何可言!以后请教之初正多,惟进而益之。从上。

即请

公安

弟 大钊顿首<sup>[13](276)</sup>

1918年,由李大钊和袁同礼首倡,北京大学图书馆与汇文大学图书馆共同发起,联合清华学校、北京协和医学校等单位的图书馆推动成立北

京图书馆协会(1919年未能获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第二年,李大钊还促成了1920年北高师暑期图书馆讲习会的举办,全国“新图书馆运动”的专家学者们汇聚一堂,讨论现代图书馆的建设,培训图书馆专业人才,为1925年中国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提供了准备和范例。此外,在袁同礼的牵线搭桥下,北大图书馆和欧美多个高校图书馆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流,具体事例前文已述,不再赘述。

#### 5 结语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有最早从事新式教育的教育家蔡元培任校长,有留美十年的蒋梦麟任总务长兼代理校长,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任图书馆专职主任,有“新图书馆运动”的主力干将袁同礼为北大图书馆的国际交流牵线搭桥。一流的人才,开阔的视野,加速了北大图书馆的现代化变革,绘就了新馆建设的宏伟蓝图。这场变革使北大图书馆实现了从藏书楼到现代大学图书馆的转变,成为当时新思想、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和传播的主阵地。北大图书馆的这种现代性变革,有力地支持了北大走向世界,为北大成为国际知名学府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 参考文献

- 1 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2 回忆李大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3 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4 Elmer D. Johnson. 西洋图书馆史[M]. 尹定国,译.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
- 5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6 曲士培. 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 北京:教育出版社,1995.
- 7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8 毛泽东. 毛泽东自述[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9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0 王学珍,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1 石烈娟. 蒋梦麟与北京大学图书馆[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4):116-121.
- 12 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3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4 蒋梦麟. 蒋梦麟自传:西湖·新潮[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
- 15 范青霞. 蔡元培的图书馆情结[J]. 兰台世界,2010(1上):21-22.
- 16 许德珩.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N]. 光明日报,1979-10-27(3).
- 17 刘国有,刘桂芳. 北洋法政学堂创办的历史考辨——为北洋法政学堂成立105周年而作[J]. 天津法学,2012(2):107-112.
- 18 吴稼年. 袁同礼早期对北大图书馆的贡献[J]. 图书馆,2014(1):49-52.

(田慧芳 馆员 玉林师范学院图书馆)

收稿日期:2019-03-19

## 澳大利亚全国图书馆 2019 年度报告发布

2019年11月28日,澳大利亚图书馆与信息协会(ALIA)、澳大利亚公共图书馆联盟(APLA)、澳大利亚国家与州立图书馆联盟(NSLA)联合发布全国图书馆2019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澳大利亚全国共有各种类型图书馆13650家,年总投入28亿澳元;图书馆从业人员2.75万人,服务用户1290万人;ALIA会员达5000家。

### 资料来源

- 1 2019: A year in libraries[R/OL]. [2020-01-13]. <https://repo.alia.org.au/2019-year-libraries>.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提供)